



## 属马的堂兄

□老 九

我的堂兄叫汉水，属马，如果还健在的话，今年应该是78周岁。

汉水本名刘良先，估计是根据他的生肖，希望他能一马当先吧。但他还是喜欢他的小名，小名大气，与长江支流中最大的一条支流同名。我记得他在画作上签名时，落款都是刘汉水。

汉水哥要年长我21岁，我有记忆时，他已经是村里农民，正准备结婚。嫂子是刚刚从城里下放，很洋气，于是同龄人都说汉水哥花功不错，人家家庭成分比他硬的，长相比他帅的，都追不上，却被他追到了手。他听了盯着对方看，仰头想想，再慢慢反问：追？哪个追哪个？是人家自己追上来的好不好？周围人都笑，只能对他的牛劲干瞪眼。后来的事实也证明，还真是嫂子铁心要跟汉水哥。我记得娶亲的当天，嫂子的娘家人还上门来闹，对着闹洞房的众人骂汉水哥，骂他是个“地主儿”，骗了人家的闺女跟他受苦。但嫂子当众亮出结婚证，说她甘愿受苦，这是人民政府批准的婚姻，谁也干涉不了。娘家人无奈何，只好骂骂咧咧地走人。

汉水哥娶亲，是一件很让他脸的事情。

他原在县城最好的中学第一中学就读，由于家庭成分不好，被逼提前回乡务农。据说他是躲着哭过一天的。他读书时功课很好，不但数理化排名年级靠前，而且琴棋书画都通。他有一句话，让村里人背地叹服，那是人家问他，怎么能够会那么多，他慢慢地说，琴棋书画嘛，彼此兄弟姐妹，脉络原本相通。至于在下的通嘛……他唱了两句据称是变调的马派唱腔——我本是卧龙岗闲散的人，老子嘛无师那个自通啊。当时村里要在村口一面山墙上画毛主席像，找不到人接活，队长问他敢不敢，他说，这么简单的事情，有什么不敢的？果然，他拎起颜料桶，两天之内，让大幅的毛主席像上了墙。整个大队，唯有我们刘胜二村的村头有这样大幅的彩像，给全村人都长了脸。

村民的感情是朴素的，真有本事的人，他们还是认可的，管他是

## 守望楼

□秦莉萍

母亲推开木门，只听“吱——”的一声。蜷缩在稻草上的四只猫，睁着惊恐的眼睛盯住门口，迅疾，大黄猫一个跳跃蹿至窗口，欲逃走，却又立在窗口不离开，尾巴左摆右摇。它一会儿盯着小猫，又掉头警惕地盯着我和母亲，一声“喵——”后，忽然纵身一跃，从窗口消失。随即，三只小猫争先恐后散开，不一会儿，便躲进巷弄，不见踪影。

“妈，您吓着它们了。”母亲掩上木门，我说。

“这一窝猫把这屋当成它们家了。”母亲笑。她说很早以前就发现大黄猫下崽后，一直逗留附近，没想到是躲在这个小屋。

“它们还真会选地方呢。”我望着这个两层小屋。

小屋是水泥砖砌成，只有五六平方米，里外墙还能看见缝迹的痕迹，小屋很小，一楼堆放杂物，二楼居住，是我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建好后，用来守橘园的。那时，每当橘子成熟季，橘子总时不时被偷，许多农户每年橘子的收入几乎是全家的生活来源。于是，有橘园的农户都搭一个简易棚，夜间守候。

初始，简易棚就是几根粗壮木料搭建，呈三角状，在顶端盖上厚薄膜或油布，底部离地面五十厘米，铺上几块铺板当床，挂上一床蚊帐即可。后因风吹雨淋、日晒夜露，一段时间后，薄膜和油布开始破损，遇上夏季暴雨，根本无法在橘棚里守夜。父母便叫了这个小屋。刚建好的那一年，我常常缠着父亲或爷爷，要到小楼里守夜。每天晚饭后，我迫不及待走向小楼，沿着小楼边沿的台阶，小心翼翼拾级而上。其实，二楼啥也没有，就一张挂了蚊帐的铺板床而已。站在小屋的窗前，说是窗，实则就是一个长约五十厘米的空洞，可以目睹我家橘园的每个角落。夜间，站在小屋的窗口前，一棵棵橘树形如

□杨 骞

出去之危险。世上本无捷径，亦无“弯道超车”，艺术创作尤其如此。如今文艺创作亦多偏重“应用”，投偏嗜政绩者之好，漠视原创以及思想与情感，虽然在某个时期能获得掌声，然终究像被反复使用之水，无法饮用，只可灌园。

### 追 求

屡闻人言：亦曾被激发过、点燃过，对美好事物向往之火焰至今未熄。吾相信其言之真，然观其行，似已偏离追求美好之轨道，如表皮光洁内肉已烂之水果。求美之举，其意义和价值不在作品，在于人。目的亦在人。

### 怀揣真诚

期望回报之慈善乃伪善，把作品当作晋身博誉筹码之创作必然有谄媚之成分，明知世人难以唤醒偏要投身其中，是宗教情怀。人之一生，白驹过隙，倘有所为，当怀揣真诚，辅以宗教之信念与行为。纵有过失，亦得宽宥。

### “无我”与“有我”

既欲“无我”，又欲“有我”，看似矛盾，实各有所指，且足可调和。

创作时“无我”：无挂碍，无种种执，无种种念。心底欲望放空，空间有天如许大，有无限大之自由。

作品中之“有我”，即有“我魂”之存在：我之思，我之情，总之曰一个“真我”而已。真我乃作品魂之所寄。

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。此乃“无我”之心态，属生活之态度，是禅，非创作时之“无我”。

行到水穷处，无路可走，便坐下，正逢有云鸢从山谷间冉冉升起，便看云。如此“心无所事”者为谁？自然状态之“我”，持“无我”心态之我。昔阮籍驾车出游，见路不通，遂痛哭而返。今“我”与阮籍有别，“我”非“阮”，此正可证明“有我”之存在，然此处之“有我”，非艺术创作之“有我”。

“无我”之心态、观念可变，然“我”则始终是一真实之存在。坚守真实之我，表现真实之我，作品中必然“有我”。

### 原 因

为何当今艺术创作难见高峰？若仅就创作者自身而言，主因有二：对艺术之特质认知不深，精致利己主义泛滥。前者导致目光短浅，格局趋小，极有可能以好心办错事。后者必然无悲悯之情怀，无崇高之追求，脱离生活，如墙头之草。思想偏狭，情感卑微，纵使知识再多，表现技巧再高，又有何用？

### 深入生活

“入”，是进入其中，感觉其里，非泛泛于表面之走马观花。“深”，是对“入”之程度之强调，且有分析研究之意。“深入生活”，既要融入且成为生活中之一个，又要保持客观独立，坚持冷静之观察与思考。

### 猜 度

为何某些“提名”类文化活动少见一流艺术家之身影？且让吾以小人之心度之：提名者鉴赏、认识水平有限；提名者出于偏狭之私心，武大郎开店——比他高的都不要；我之地盘，旁人休得染指；拉帮结派，党同伐异。有高手被提名不愿参与，深究其因，恐亦与上述因素有关。

### 对待批评

有人喜欢倾听批评，如喜于阳光下翻晒衣被；有人畏惧批评，如尿床之孩子企图用自己之体温将被褥捂干。自私与虚荣并非某些人害怕批评之主因，色厉内荏、狭隘、愚蠢才是。

### 铜 镜

“朋友圈”里之评论就像一枚年代久远之铜镜，锈迹斑斑、物象模糊，然多多少少仍能映出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真实面容。对熟人不问青红皂白一律褒奖有加者，于生人之前亦必多伪饰，易生欺人之念。

即使不便“实说”，至少还可以“不说”。

### 像反复使用之水

忽视基础研究与创新，只在应用方面全心投入，此种模式发展起来之科技，就像一只脖子上拴了绳子之羊，闯进菜园饱餐，然随时有被“请”



晨钟惊飞鸟

□冒小平

## 我的英语启蒙老师——蒋兆一先生

1957年秋，我考入南通一中，分配在高一（3）班就读。当年的初中生没有外语课。只有高中生才学外语。那年高一新生共有4个班。一班和二班开设俄语课，三班和四班开设英语课。蒋兆一先生就是我们的英语老师——我的英语启蒙老师。

蒋老师当年二十七岁，年轻英俊，身材魁梧。他毕业于四川大学英语系，发音标准，讲解清晰，备课充分，要求严格。我们上英语课，都不敢有半点懈怠。第一次小测验，我得了全班的最高分，使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英语，以至于到高三选志愿时，我就填了英语专业。后来，我考上了南京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。

凡是上过蒋老师英语课的学生，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：进了大学，都觉得大学英语课特别轻松，因为他们在中学已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

1960年秋，我到南大报到后不久，因病休学一年。南大是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，本科学制为五年。我从1961年秋到1966年夏在南大就读期间，每年寒、暑假都会去看望蒋老师，向他汇报我在校学习的收获、体会。蒋老师每次都会聚精会神地倾听，虚心、平等地和我讨论英语学习中的各种问题，一点没有学术前辈居高临下的架势。我清楚记得，大学一年级的那年暑假，我去蒋老师那儿，和他讨论英语单词中有些辅音的发音问题。我说，在[s]后面的[p、t、k]，发音时不再送气，如sport、study、sky等。他听得很认真，问得很仔细。蒋老师这种平易近人、思想开放、虚怀若谷的态度，是吸引我和他继续交往的主要原因。

我本应在1966年夏天大学毕业，但史无前例的“文革”席卷全国。学生无法毕业，滞留学校一年半。后来，我去农场劳动锻炼两年，再重新分配到东台县，先后在该县的三所学校工作了三年。1973年5月，南大把我调回并派往英国学习一年多。1974年9月回国后，我在南大外文系英语教研室（现在的名称是：南大外语学院英语系）任教。在这一

时期，我们讨论学术问题少了，讨论教育改革多了。

1976年“文革”结束后，我利用寒、暑假回南通的机会，有幸为蒋老师做了两件事。一是为他英语专业的学生办了一期暑期培训班，使用我从英国带回来的教材。二是有一年寒假，替他的大女儿蒋静仪和其他两位学生辅导英语，准备参加高考。

我觉得能为自己敬重的英语启蒙老师做点事是一件幸事。这是恩师对我的信任，也是我报恩的一个机会。但当时令我不解的是：他自己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英语老师，为什么还要我来辅导他女儿的英语呢？他的回答却是出乎意料：“教师往住教育学生很好，教育自己的孩子不行，因为教育自己孩子的时候通常缺乏耐心。”其实，蒋老师这话也不能完全当真的。他家的三朵金花，后来都考上了中国的一流大学，并且学有所成，毕业后工作出色，家庭和睦，衣食无忧。三姐妹相亲相爱，亲密无间。现在，她们的孩子——蒋老师夫妇的第三代，有的在大学就读，有的已经大学毕业，开始工作。

可在当时，蒋老师的话确实使我感到意外，也许是因为那时我的女儿还小，才四五岁，还没上小学。我和爱人又分居两地，孩子的教育问题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。但听了蒋老师的话，我当时的想法是：我将来既要教育好学生，也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。后来，当我的想法变成现实时，我则十分感谢蒋老师当时给我的指点。

1982年秋，我爱人工作调动终于成功了。从此结束了我们夫妻长达十年的两地分居。但我们每年都回南通过春节，和家人团聚。我每次回南通，还是去拜访蒋老师。我们聊天的内容不再局限于学术问题，而是涵盖教学、教育、改革开放、价值观各个方面。有一次，蒋老师对我说：“作为一个教师，一个学者，不要太过看重名利，不要太过看重金钱、职称、职务。”我完全认同他的意见。这也是我在南大任教三十年工作愉快的主要原因。

□吴克明

我学习蒋老师教书育人，在教学工作中，既对学生严格要求，又和学生以诚相待，和他们交朋友。我曾获得院、校、省、部各级颁发的优秀教学奖十余次。这些成绩都与蒋老师的教导和帮助密不可分。

我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每次我去拜访蒋老师，他的爱人蔡老师总是在我们聊天的时候，大展厨艺，做上一桌淮扬菜，留我们吃饭。我和我爱人曾多次邀请他们到饭店聚餐，但都被他们婉拒。最近十几年，蒋老师夫妇年事已高，不再留我们在家吃饭，而是外出用餐。2014年夏，我女儿吴玲和外孙女薇薇从美国回来，我们一起去拜访蒋老师夫妇。晚上，他们邀请我们去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。席间，我女儿说去洗手间，实际上是去把账结了。等大家吃完离店时，蒋老师才发现我们已经付了款，用手指指我说：“你呀，你呀。”

我真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这样做，只是实际上这已不可能了。同年10月下旬，蒋老师不幸患脑中风住院。所幸的是，在他家人的精心安排下，在他夫人、二女儿蒋静文和女婿王亚明医生的细心照料下，已经在医院安祥地度过了将近六个年头。

2019年10月，我回南通参加母校百年校庆。校庆结束后，我和同窗葛铭仁一同去医院看望蒋老师。他躺在病床上，面色尚好，我握住他那双温暖的大手，向他问好，并且告诉他在校庆纪念大会上，有好几位校友发言向他致谢、致敬。但他已经不能讲话，只能用铅笔在纸上写了一个“吴”字。最近听他二女儿蒋静文说，蒋老师已经用上了呼吸机，有时已经神志不清了。

如果从1957年秋蒋老师开始教我英语算起，我们交往至今，已经超过了一个甲子。六十多年来，我和蒋老师从最初的师生关系，逐渐演变成亦师亦友的关系，演变成成为终生的朋友，从而让我获益匪浅。可惜本文所写的，只是其中的沧海一粟。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，我没能早一点在蒋老师患病之前写成此文。